

定会乱扔垃圾了,这里是环境意识不强的人作出环保行动的例子。同理,也有环境意识较强的人在一些特定的情境下,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却不一定作出环保行动,比如说基于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人的成本收益考虑、个人当下的优先选择、外部监督的无力,等等。在我们这个社会,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具体、不完善,导致外部约束不力,是一个重要因素。甚至,目前的有些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反向的激励,不是支持你作出实际的环境保护行动,而是对作出这种行动的人实施这样那样的限制与惩罚,以至于做好事的人得不到好报。当很多人遭遇这种情况,也就形成了一种社会记忆和经验,限制了其自觉作出环保行动。

在我国,还有文化的原因。费老说过,中国人的公德意识薄弱,往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有到了环境破坏真正损害到个人利益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对环境的关心和行动可能会一致起来,但往往是采取一些激烈的抗议和冲突形式。此外,由于另外的文化传统的存在,即使是在上述情况下,一些人也还是倾向于保持沉默、逆来顺受,因为他们知道“枪打出头鸟”,了解明哲保身的重要性,期待着别人的奋起或者某种虚无的未来报应。这样一种文化心态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但是确实是不利于自觉的、常态化的环境保护行动的发生。

耿:您如何看待中国环境社会学的未来发展?

洪:总体来说,我是很乐观的。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06年第一次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环境社会学,越来越多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成果发表。环境社会学者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制度化、国际化。第二届中国

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的顺利召开,以及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中国环境社会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首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2009年在台湾地区召开的第二届东亚环境社会学国际研讨会,都是很好的例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社区正在形成。2008年12月,我们组织了中国社会学会人口与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换届,得到了很多同行的响应和支持。国内一些高等院校正在形成力量较强、特色鲜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方向和研究团队,例如河海大学社会学系、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海洋大学社会学系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刚刚正式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环境社会学研究所。

参加第二届中国环境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我很受鼓舞。很多充满自信和期待的年轻人加入到环境社会学研究队伍中来,是这个学科的一大幸事,未来的前途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环境社会学在中国刚刚发展,所谓老师实际上也是学生,这种师生同修、教学相长的场景是很有特点、很有希望的。我还看到了老一辈社会学家对环境社会学的殷殷期望和大力扶持,像郑杭生先生这样著名的社会学家,始终关注着环境社会学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密切环境社会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之进一步制度化,同时努力扩大环境社会学的影响。如果我们通力合作,加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关注当下中国的环境问题,积极参与到环境政策中去,重视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并自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社会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加强环境社会学教材的编写和专业人才的培养,那么,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美好未来就是指日可待的。

## 中国社会视野中的环境社会学研究

——陈阿江教授访谈录<sup>①</sup>

【人物简介】 陈阿江教授,江苏吴江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社会学专业,获博士学位。2005年~2006年获国家留学基金会资助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应用人类学研究所访问研究。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农村发展、社会评价等领域的研究。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江苏省社科基金及中国科协、农业部、水利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研究课题20余项。出版了《次生焦虑》、《制度创新与区域发展》等著作,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中图分类号:C91 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2-0016-04

收稿日期:2011-04-21

受访者简介:陈阿江(1963—),男,江苏吴江人,河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

① 本访谈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王婧进行访谈及整理,陈阿江教授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审核。

王婧(简称王):陈老师当初为什么选择社会学专业?

陈阿江(简称陈):或许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吧,我是学选矿的,当时和我们班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想换专业。那时我对哲学、心理学、文学之类的领域觉得很新奇。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通论性的文科类教科书,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我都想探个究竟。后来觉得可能社会学比较适合我。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学起来比较快,比如社会统计,理工科的学生学得比较快。另一个是地缘的关系,费孝通是吴江人,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写的文章有不少是关于苏南吴江的话题,如关于农村长毛兔发展中的问题等,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深切感受和关注这类事,所以感觉社会学是可以和我的生活紧密结合的。

王:您又是如何进入环境社会学领域的?

陈:最早是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环境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主要是环境问题。当时我的博士论文涉及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与地域相关的圩田制度研究。圩田是一个系统,它属于自然环境,但同时也是长期的人工劳作后的历史遗存。比如说,我们看的河岸、水田等,这其实是经历过长期的历史改造后形成的,圩田系统也一样。与环境相关的,涉及河底淤泥及其利用等一系列问题。还有就是工业化污染。当时我在吴江,特别是在盛泽地区做调查的时候,跑了很多工厂。在调查过程中,别人经常提起,我也亲身感受到了,那就是日益严重的工业污染。比如,我们老家附近有个小化工厂,晚上总是排放一些刺鼻的气味,后来博士论文就形成了两章,前面有一章是关于圩田系统的,后面有一章是关于工业化污染问题。2000年我在《南京师大学报》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水域污染的现象。

王:您觉得您的生活经历与您从事环境社会学研究有什么关系吗?

陈:如果把我們小时候的场景和现在对照起来,就会发现其中的变化之大了。我们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水是清清的,水里面有水草,水草可以喂羊,也可以做肥料。对于村民来说,早晨起来就到河边提水(当时没有自来水嘛),用河水淘米洗菜。早饭后河边洗碗。妇女们在河边洗衣服,晚一些时候,又有很多人淘米、洗菜,准备午饭……河埠头附近的水面,许多鲢鱼游来游去,有时甚至会不小心窜进谁家的淘米箩里,想吃米虫。夏天的傍晚,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可以游泳,有时候中午还下水。河边有渔船,有网捕的,也有鸬鹚(也叫鱼鹰)捕鱼的。

我们小时候看鸬鹚捕鱼,有一次看得忘记了时间,上学差点迟到。主人一赶,鸬鹚就下水去了,浮上水面的时候,就捕鱼上来。它们的脖子上系着一根线,小鱼可以吃下去,大鱼吞不下,主人就来接它,把大鱼取出来。主人怕伤了鸬鹚的积极性,取走大鱼的同时,往往再给它喂条小鱼。然后鸬鹚就继续捕鱼了。

但是90年代以后,水就慢慢变了。我们这边农村,中老年妇女有早饭后喝茶的习惯,七八个人就坐在那里喝茶。她们会品茶,所以对水质也比较敏感。某天,听到议论说:“今天喝的茶怪怪的,这个水怎么有味道?”开始是偶尔出现的,后来,这种情况越来越频繁……水产品也一样,某天有人发现鱼的味道不对劲了,有柴油味,或者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就是化工厂污染水源了。渐渐地,这种事情越来越频繁,甚至大家都不敢吃鱼了。后来大家都不敢喝河里的水了,河水太危险了,只好喝井水。我1994~1997年在读博士研究生,正好感受了这些变化。

我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农村发展的,其中想写一个关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比如贫富不均,是可以作为发展中的一个社会问题来处理的。但是我选择了“生态失衡”来写,现在看好像这个敏感的点还挺对的,但在当时,我还只是一种感受,觉得应该把它写出来。我记得写过这么一句话(大意),工厂建了很多,马路也变宽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水喝,粮食不能吃,鱼也不能吃,那么,我们生活的意义何在呢?源于这样的考虑,我就一直关注太湖一带的水问题,看看水是不是能慢慢好起来。这期间政府也作出过一些承诺,比如“零点行动”,但实际上,感觉水的状况是越来越差。后来申请到江苏省社科基金课题“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学分析”,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2005年去美国访问研究前到太湖流域进行了实地调查。

王:您能谈谈您去美国的留学经历吗?听说那个时期您对环境问题也有了更深的思考。

陈:2005~2006年在亚利桑那大学应用人类学研究所呆了一年。最大的好处就是时间有保障了,此前因为我们社会学系新建,有很多事情要做,时间难以保证。在美国主要想了解美国社会的状况,通过了解美国社会来反观中国社会——我的关注点还是中国社会。这也有助于我来看中国的环境问题。除了英文,他们那里有一个中文图书馆,不算大,但我想要看的书基本上都能找到,馆内有费孝通的书、金观涛的书、梁漱溟传等,很方便。我现在的这本书《次生焦虑》,绝大部分是在访美期间写成的。

去美国之前,我有较长时间的积累,我跑的地方

也不少,包括一些中西部地区,做了很多的农村调查。虽然都是一些没有出版的研究报告,但是对我来说,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基层社会,积累了很多认识。所以我跟学生说,走出书斋,多了解中国基层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这样的经验,到美国之后集中时间来读书、反差性地体验、交流与思考,解开了多年的谜团,对中国社会自己有了整体性的看法。在美国的一年,主要还是来看中国社会,就像我们有了比较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以后再去乡村社会,似乎更清楚。这是从先发达国家的模板来看中国社会。在日本也是一样,我在日本的时候也跑了很多地方,了解日本主要还是想认识中国社会。

王:您能再深入谈一下“次生焦虑”吗?

陈:大概是说一个心态吧。简单说,就是把环境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看,而这样的社会问题,主要源于我们近代以来追赶现代化的急迫的社会心态。说到这里,我这几天在看曹锦清的文章时,在想“大学是干什么的?学者是干什么的?”现在不少研究生有一种焦躁的心态,刚刚入学或者是还在读书时,就想着怎么赚钱,怎么找工作,怎么买房子。你为了生活过得好,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你要想要从事学术,总该有点理想吧。“文革”时期的下乡知青苦不苦?在山区、在草原学数理化、看外语有什么用?至少直接的效用是看不见的。不仅如此,白专道路还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但是,只有那些有理想信念的人,恢复高考后才有机遇。我在研究生开学见面会上说过,研究生一定要有理想,如果想以学术为业,没有理想将一无所成。举例说,你决定要想爬100米高的山,有可能你爬不到顶,但是你可能爬到七八十米高,如果你的目标只是10米高,那你能够达到的极限就是10米。如果想做学术一定要有理想,要有社会责任的担当,有为国家、人类社会的担当。特别是社会科学的从业者,你只有这种担当,才可能摆脱个人的小圈子。比如你写文章,老惦记着发这些文章的实际利益,那么,这样的文章发得越多,思想就越萎缩。

王:那么,您是认为这种为文章而文章的现象很普遍吗?或者说现在的很多文章和中国的现实脱节吗?

陈:我不敢说“为文章而文章的现象很普遍”,但是我觉得研究生,特别博士研究生,应该树立正确的科研态度。目前比较简单的一种做法就是用西方的理论来套中国的现实。比如说,“社会资本”的概念,是否考虑过“资本”与文化的关联?“资本”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如果简单地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网络”,在中国社会的实际应用中很可能会走偏。

王:最近我们读后现代的文献,特别是福柯的书,您是怎样认识后现代理论与环境问题关系的?

陈:早先后现代问题我也没有搞明白,我到美国以后就渐渐明白了。先说说现代社会是一个什么格局吧。我在美国生活了一年,感受到了现代社会大概是一个什么状况。国内的现代化进展,这几年慢慢清晰起来了。比如长江三角洲高铁的开通,与美国、日本的差距就不是很大了。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要有工业化、现代化,但不知道“化”到什么程度,现在我们有了,而且很多是过去我们无法想象的。过去,我们觉得出门打打车,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现在不少家庭有汽车了,再过若干年,更多家庭会有汽车,这都是过去没法想象的。再来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衣”的问题解决了,“吃”也没有什么问题,“住”在城市里的问题可能多点,但是有的也是由于年轻人要求太高,毕业以后马上要求房子,如果放宽心态,“住”差不多5~10年时间可以解决。我1995年去胜天村调查,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村长说,我们现在和国外只有两个差距了,第一,国外家家有汽车,我们没有;第二,他们街上很干净,皮鞋不要擦,我们做不到,其他的我们都有了。如果今天再去找那个村长谈话,家家有汽车,他们村庄应该基本实现了,就是环境没有跟上。“现代社会”一建立起来,或者在建立过程中,你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很多问题。再比如做环境问题,有很多是跟现代性相伴生的,难以消除的。学者往往关心前沿性问题,就是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事。所谓的后现代理论是建立在在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基础上的。

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可以说可控的部分基本控制了,比如说点源污染,因为他们有完善的法律,工厂也不大会出现偷排的情况(虽然偶尔也会有偷排现象),可控部分是把握得比较好了。回到我2005年写书的时候,那时候中国工厂偷排污水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发达国家已经建设了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而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滞后的,比如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很不完善,县以下的小城镇基本上没有污水处理厂。但是,这些是可以逐渐完善的。还有一些问题是与跟现代性相伴的,它实际上没有解决,也很难解决。这大概就需要用“后现代”的视角去考虑。比如我们现在大量地生产,大量地消费,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尽管也在回收利用,但是回收利用之后又产生了新的垃圾……我们是否能少生产一些、少用一些呢?这是个两难的话题,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比如说我愿意穿一件领子已破的旧衬衫,从我内心来说,我觉得洗干净就可以了,但实际上,我不可能穿到课堂上来。“后现代”理论其实是

一个视角问题,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细细琢磨,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你看福柯的著作,什么精神病院啊,监狱啊,我们现代社会建立以来,觉得这些制度都挺好,把精神病人关进去,这样对他自己也好,对社会也安全。但是我们再细细地想这样的制度性设置,真的是这样的吗?可能还不是这样的。再比如说法律制度,你可能觉得法律制度很完善,但仔细想想,真是这样的吗?假如我们两家是在一个村落社会里,为一棵树,或是为了土地的边界两家打起来了。按照现代社会的标准做法,我们两家就得到法院打官司。在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点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们来反思这样一个制度设置时,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吗?回到传统社会,让族长出面,把我们两家人拉到一起,各打50大板,然后再说说,喝点酒,不就没事了吗?不是成本更低吗?情感伤害更少吗?解决问题的效率更高吗?虽然说,我们很难回到过去了,但是不等于说对这些制度就没有反思的余地。我们从西方学过来的一系列制度,我们是否想过,是不是有更聪明的办法来替代或改进这种制度呢?即使一时拿不出方案,但是我们至少有思考的空间。“后现代”就是要我们反思业已建立的、看起来似乎是很完美、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应该这样从福柯那儿去学习。

王:后现代理论是在反思西方现代社会。中国的情况会不会更为复杂,中国社会本身有一套逻辑,然后它又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制度设计。用后现代理论来看中国的环境问题,是否它只是解释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还需要很多本土化的理论视角?

陈:应该说是中国社会有自己运行的一套逻辑。曹锦清提过一个说法,挺有意思的,他说儒家传统强调责任,换句话说,不管谁当领导,如果对人民负责,就是一个好政府。不管你采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需要这个政府是对下面负责。这是我们儒家一直延续的一个传统。

我认为,中国社会一直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在运行,而从来没有按照西方的那套运行过,虽然也受到西方社会的很多影响。“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些提法,就是不断地学习外来的,不断地包容,同时也传承了一些很重要的本土的东西。可以看到中国社会运行有它自身的特点,肯定不会跟美国一样。

王:请您再谈谈从“人水不谐”到“人水和谐”的转变吧。

陈:这个还在观察之中,在那篇《再论人水和谐》的文章里,我写了一些。现在看来,人水不谐的原因比较清楚。我们现在在做的关于环境—健康的研

究,其实也是关于人水不谐的问题。我们在研究村民是如何认识污染的,以及他们是如何采取措施的。这里,污染和癌症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医学问题,还夹杂了很多经济、社会的因素,社会结构对它也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江西的一个案例,它原来是一个农场体制,后来演变成的一个居民区。从我们现有的调查来看,找不到污染和癌症之间的关系,但是居民就深信癌症是由某个工厂造成的。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上访,这里面就有一些利益诉求,还有社会结构的一些东西——它是一个农场,有很多“单位制”的遗存。

关于人水和谐,我也说了一些。江苏宜兴的案例说明,企业污染是可以解决的。环境治理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难,技术没有那么高深,成本也没有那么高。案例中有一个油墨厂因迫于将来的环境压力,提前转产就很有意思。到嘉兴的调查,让我们多了些信心。现任的区环保局局长,以前是交通局长,他的思路是把污染处理系统类似于道路那样建设,农村地区也全部接入管网,而过去,污水处理系统只在城市,农村没有纳入。他让小工厂的污水全部接到污水处理厂。即使将来工厂破产,这些村级污水处理厂,作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系统继续使用,这些基础设施就不会荒废。

王:您觉得未来的中国环境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

陈:我原来关心污染的“拐点”问题。就我的经验研究看,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现在差不多应该是污染的“谷底”了,以后应该慢慢好起来。中部地区的工业化正在加速,工业污染还会有加重的可能。但是,后发展地区确实也有后发的优势。苏南浙北的乡村工业是“村村办厂、户户冒烟”,后发展地区普遍采用了工业集中区的建设模式。比如说江西,我到过京九线、赣龙线沿线的很多县,工业大部分集中在工业园区里。这样的情况,从理论上说,污染容易处理,如污水可以进管网,然后集中处理。这就是后发展地区的环境优势吧。后发展地区的一个问题是污染转移,把一些污染的工业转移接受了,包括江苏污染的“北漂”,这是它的另一面。

环境的改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学研究对环境的好转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管理体制方面的完善,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这些都跟我们相关。媒体的工作对中国环境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政府是处在“操盘手”的位置上,起关键性的作用。但政府的运作是如何发生改变的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环境治理需要资金投入,这是很重要的,地方政府环保运作的改变,资金是前

提。地方政府的观念转变也极其重要。技术不是问题,但是能解决当时当地实际问题的,往往不是单一技术,而是一个技术“集成”,包括技术与体制的有机结合问题,这需要有思路。前面提到的那个区环保局局长,他想出来的办法,包括技术、管理、财务等,是根据地方特色设置的创新做法。它不是搬自城市,也不是搬自国外。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势”——“趋势”中“势”的问题。孙中山有句话:“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清朝是被辛亥革命推翻的,但实际上是它自己要灭亡了,所以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它就没了,要是在乾隆时期,这革命能成吗?这几年,解决环境问题的“势”慢慢

在蓄积。随着中央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定位,民众的愿望,地方官员的认识,媒体的宣传等,加上财力条件也慢慢具备了,所以才有可能率先在某个地方突破。如果“势”不到,综合条件不具备,那么它是不可能改变的。

大概来说,工业社会能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也在慢慢解决,但是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现代性的困境”。这是一个难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看我们有多少政治智慧、多少生态智慧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传统的生态知识、特别是我们中国农业社会中有很多生态智慧,是可以借鉴和学习的。

## 环境社会学的学科理念和研究方法

### ——包智明教授访谈录<sup>①</sup>

【人物简介】包智明,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民族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1985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89年考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专业博士学位;1991年~1993年作为中日政府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赴日本国立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留学,学习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博士课程。1994年北京大學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社会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等。出版有《比较社会学》、《科尔沁蒙古族农民的生活》等个人专著和《环境社会学》、《民族社会学概论》等多部译著、合著。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数十篇。主持或参加的各类研究项目有十余项。

中图分类号:C91 X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1)02-0020-04

王婧(简称王):包老师,请问您是如何进入环境社会学领域的?

包智明(简称包):这要从我到北京大学工作说起。1988年我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现在叫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社会学研究所是费孝通先生创办的,我在那里做的也都是费先生的课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一直想做我的家乡——一个农业化的蒙古族地区的研究。因为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蒙古族与现实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一直想通过研究让人们了解真实的蒙古族社会文化。后来我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选题却是比较社会学,是属于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研究,做这个题目也是导师的要求。20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复的时候,费先生曾提出要建立社会学系最起码应开设6门专业课程,其中一门就是比较社会学。

1991年我在确定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其他5门课程均已开设并有相应教材正式出版,唯独比较社会学这门课程还没有开设且无人专门研究这个领域。所以,费先生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那时候费先生的思想和后来不一样,他提倡社会学和人类学不分家,所以当把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一门课程的时候,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学科叫做比较社会学是很自然的。当时我做博士论文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按照费先生的要求,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能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一门叫比较社会学的课程。

我是1989年起在职攻读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1994年毕业的,一共读了5年。其中,在国内读了3年社会学,在国外学了两年文化人类学。由于我学了这两个专业,尽管我在学校里教的是社会学,但在

收稿日期:2011-04-21

受访者简介:包智明(1963—),男(蒙古族),内蒙古辽通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从事环境社会学、民族社会学研究。

① 本访谈由河海大学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王婧进行访谈及整理,包智明教授对访谈内容进行了审核。